

## 評價與反思：晚清溫州維新知識群體\*

◎ 劉練軍

晚清溫州出現了一批在全國頗有影響的維新志士，他們的維新思想在當時維新浪潮中思想氣質獨特、鮮明，鼓舞、推動了維新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地展開，他們在維新方面的躬行實踐取得了惠及至今的成就，為其他省份和地區維新實踐之舉行做出了表率。具體地說，這批志士主要有孫衣言、孫鏘鳴、黃體芳、孫詒讓、宋恕、陳虬、黃紹箕、黃紹第、黃慶澄、洪炳文、金晦、陳黻宸、池志澂、宗源瀚等人。以整體而論，這一維新知識群體還處於歷史的塵封中，他們的維新思想及實踐活動還未被後人爬梳整理、認識評價，像塊「處女地」。筆者既然已從整體上對之進行了淺層次的梳理、開墾<sup>1</sup>，索性就不顧淺陋，把它置於寬視界的微觀「維新」話語和遠距離的宏觀歷史語境中對它進行最後的透視——評價與反思，以就正於方家。

可以說，一部人類的歷史也就是人類不斷進行「維新」以適應時事進步發展要求的歷史。但作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話語中的「維新」，則又非普遍的一般意義上的維新。它特指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英國以堅船利炮撞開中國的大門後，中國有識之士為「家」「國」計而倡導、踐履的從器物到制度進再到文化觀念漸次進行的變法改良。從前驅先路的魏源、馮桂芬到進入高潮、改良維新思想成熟並全面啟動的康有為、梁啟超，這一過程歷經半個世紀。不論是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早期維新思潮，還是接著而起的戊戌維新運動，在溫州知識群體中都能找出有時代影響力的代表性人物。前者，如陳虬等；後者，像宋恕等。不但如此，我們還可以列出足夠多的證據表明陳虬曾作為領袖戊戌變法的康有為的夥伴，對康產生過不容忽視的影響。

與宋恕、孫詒讓對古文經學頗有研究，並從中發掘出變法維新的理論資源不同，陳虬是從今文經學起家的。一樣的今文經學變法理論根源，讓陳虬與康有為彼此相吸、志同道合。1898年春，因會試至京師的陳虬，與康有為同發起成立「保國會」。眾多的資料顯示，陳康此時相當地接近，甚至康有為在京的主張變法活動，都頗依重於陳。被陳虬稱為「子最知我」的利濟事業上的同事池志澄，在《陳蟄廬先生五十壽序》中說：「先生（指陳虬——引者注）以公舉赴都，與海內志士上書首倡保國。」陳虬利濟醫院的弟子楊逢春在《憶先師陳虬》中說：「京裏有集會演說，康就叫我先生講。」陳虬的另一位弟子則指出：「康有為、梁啟超等議開強國會，要先生屬草稿上書，定章程，二公皆自為勿及。」<sup>2</sup>孫詒讓甚至認為，康有為是受到陳虬的哄騙才導致變法的失敗。<sup>3</sup>不管我們對上述資料應給予多大的信任，但歷史事實是不容變更的。那就是康有為當時的大多數變法主張陳虬早在幾年前就提出過。而在戊戌變法高潮來到的前夜，陳虬人在京師，參與了倡導、組織成立保國會活動，並在保國會上慷慨發表演說等都是客觀事實。此時在京的陳虬頗為活躍，還表現在召集浙籍在京舉人組織保國會浙江分會——保浙會。同時，他還上《呈請總署代奏摺稿》，指出「利不外溢則富，權不

旁掣則強，必使人人有保其身家性命之權，而後國家可收其臂指腹心之效」。<sup>4</sup>陳虬的上述活動，足以說明在變法維新高潮到來時，溫州知識分子並未游離於維新宣傳、鼓動之外，相反，而是在積極地參與、籌劃，對戊戌維新的深入開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發揮了相當的影響力。

作為早期維新思想家的重要代表，陳虬把同時代的思想家如王韜、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陳熾等改革君主專制制度的政治改良要求以最為明白的語言表達出來——「泰西富強之道，在有議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未」。<sup>5</sup> 陳變法維新理論著作如《經世博議》，被收錄在陳忠倚編的《皇朝經世文三編》，而1893年12月他出版的八卷本《治平通議》，被看作是社會改革與變法維新的重要思想文本，迅即受到了上層社會的重視。當時的兩江總督張之洞「見陳氏《通議》而大悅，渴欲接洽」。<sup>6</sup>梁啟超將此書列入《西學書目表》。陳虬聲名因之而雀起，成為維新派的一面旗幟。與之相輝映的是，宋恕的變法維新綱領《六字課齋卑議》以其驚世駭俗「開風氣之先」的改革主張而令人刮目相看。李鴻章、張謇、黃紹弟、王韜、梁啟超、譚嗣同、章炳麟、俞樾、王修植等等都讀過宋氏《卑議》。譚嗣同譽之為「後王師」，梁啟超將其列入《西學書目表》。後人還認為《六字課齋卑議》在反映封建社會下層民眾的痛苦和揭露斥責三綱五常封建理學的殘暴虛偽方面，其許多論點「達到了康有為《大同書》、譚嗣同《仁學》的思想高度」。<sup>7</sup>不但如此，宋恕還與上述維新派代表人物有著廣泛、深入的交往。其中與譚嗣同最為相契，譚對宋評價甚高，稱他為「兀者中分通國士，卑之猶可後王師」。<sup>8</sup>和梁啟超的私信往來頻繁，內中詳述了宋恕本人對梁的乃師康有為由誤解到「戊春見更生《孔子改制考》，始服更生之能師聖，始知更生能行污身救世之行，而前疑冰釋」的過程，彼此「精神之交」不同凡響。<sup>9</sup>1896年宋恕還與譚嗣同、梁啟超、孫寶瑄等六人攝影於上海光繪樓，是為《竹林圖》。

據上述，我們可知晚清溫州知識群體在維新運動中其代表人物的變法維新思想與變法活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們的維新思想是維新運動的重要理論來源，他們的維新活動推動了運動的深入前進。他們和當時那些最為活躍的維新派思想家之間的互動擴大了他們在全國維新群體中的影響力。總之，在近半個世紀的晚清維新浪潮中溫州知識群體裏出現了像陳虬、宋恕等著名的維新思想家，他們為晚清維新運動的啟動與發展作出重要的理論貢獻，維新運動興起時他們又多活躍於第一線，身體力行地推動著中國近代的變法維新運動，加速著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如果用最簡單的一句話來評價晚清溫州知識群體在全國維新運動中的歷史地位，我想，最常用的一個比喻也許是最合適的，那就是「是金子總要閃光的」。

晚清溫州知識群體上述維新思想理論及維新活動固然影響非凡，難能可貴，但以筆者之愚見，最能代表晚清溫州維新方面特色的並不在這些「坐言」及宣傳、鼓動上，而在於他們的「起行」中，即踐履、躬行改良維新的事業中。列寧曾深刻地指出過，「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因為它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sup>10</sup>的確，任何思想理論的認識，如果不能在實踐中發揮其固有的思想物質力，把概念化、抽象化的思想力轉化為直接現實性的物質化生產力，那麼這種理論認識也就沒有多少實在的價值和意義。也因此，早在1845年春馬克思就把人的思維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定為一個實踐性的問題，而不是一個理論性的問題。他說：「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sup>11</sup>晚清溫州知識群體在維新實踐方面比全國其他地區「起」得不算晚、「走」得更遠。創造的諸多第一，使「開風氣之先」的桂冠非他們莫屬。如近代第一所中醫學校——利濟醫學堂，第一份近代知識份子自編的新式教科書——《利濟教經》，我國第一份數學刊

物——《算學報》，第一個地區性的數學學會——「瑞安天算學社」等等。<sup>12</sup>當然，僅僅這幾個第一，遠遠代表不了溫州知識群體維新實踐的全部。但這幾個第一就足以證明，像七百年前他們的前輩——永嘉事功學派一樣，晚清溫州知識群體對經制事功不但在「坐言」上研究關懷、宣傳鼓動，而且在「起行」上躬行實踐、創造佳績。

從長距離來看，晚清溫州知識群體的維新思想及其實踐活動，可以被認為是南宋永嘉學術與當代溫州模式之間的橋梁。永嘉學術，作為代表溫州地域特色的思想文化被晚清時代的溫州知識群體所繼承，並被結合那五千年未有之變局所帶來的時代救亡要求其思想內容得到了豐富與發展。晚清溫州知識群體的維新思想及其實踐，其實可以看作是永嘉學派在晚清這個特定時代的「復活」。為了適應晚清這個大變局時代裏國計民生的現實需要，承繼永嘉學術的溫州知識群體站在改善民生、富強國家的這個形而下的「現實」立場上，提出了一系列的自由發展經濟的近代化舉措，並在實踐中身體力行這些改革主張。如陳虬在《溫州出口土產宜設公司議》裏出主意說：「一切出口貨物皆分設公司……願入股份者，先將貨物按時酌值，計數給股票」，待出口銷售後，「所贏子錢若干，照數派還」，「如再有走私者到此，公司先行貶價以窘之，當無有再入股者矣」，想以此來壟斷市場。<sup>13</sup>如此的提議，不是已頗有現代市場經濟股份公司的性質嗎？而當代溫州模式中最值得溫州人驕傲的溫州人自己發明的「股份合作制」，和陳虬的這個主意相比較，又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嗎？沒有！只要對溫州進行長距離的縱向歷史比較，就不難發現：在任何帶有轉型性質的大變革時代，溫州總能產生出時代真正需要的弄潮兒。中原未定、江南一隅的南宋是如此，外族瓜分、國將不國的晚清是如此，計劃不靈、經濟蕭條的當代改革之初也是如此。對於溫州此種現象，與其說是一種歷史偶然，還不如說是一種地域思想文化的必然，更讓我們信服。我們沒有理由不認為，今天溫州模式的誕生是過去幾百年來溫州獨特區域經濟思想文化傳統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複出。關於當代溫州模式，在內涵上，我們可以分析列出很多溫州人自創的獨特經濟發展思路，但其背後的創造衝動及支持著他們在「異端」式的自創道路上堅持下去的內在精神動力則是永嘉事功學術和晚清溫州知識群體的變革維新思想在當代溫州人內心的映像。晚清溫州知識群體對西方政治經濟結構和科技文化的學習吸收、倡導實踐，無疑是當代溫州人把西方市場經濟規則與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實際相結合創造溫州模式的先導和榜樣。當代溫州的創業人員和近一個世紀前的晚清溫州知識群體，在實事求是、大膽改革、勇於創新方面是血脈相傳的。晚清溫州知識群體在溫州發展史上有它特定的歷史地位，就是從這個角度上而言的。

分析了晚清溫州知識群體的維新思想及實踐在溫州的歷史地位之後，我們就來反思一下，晚清歲月裏在溫州這個浙江南部一隅的小地方何以會出現這樣一個知識群體。所謂反思，也就是我們不滿足於前文運用社會資本範式和永嘉學術傳承所進行的就事論事式分析<sup>14</sup>，而要走得更遠，看出其背後的地理因素與人文根源。背山面海的溫州，七山二水一分田，土狹民貧人多。<sup>15</sup>如許惡劣的生存條件，培育了溫州人務實不務虛、注重國計民生的實事求是精神，使得自古以來溫州人就有戀家不守土，重視發展工商業和海外貿易，並有移居海外謀生求存的傳統。溫州成為有名的僑鄉其原因也就在於此。同時瀕臨大海，終年海風的吹拂，也激起了溫州人的勇氣，使得他們超越那「天賦」的有限的一切，用冒險、進取、拼搏的精神去征服、擁有一切。農耕文化向不發達的溫州，很早就有發達的農商文明。據記載，早在宋代，溫州就街道縱橫，店肆林立，商賈輻輳，所謂「其貨纖靡，其人多賈」。<sup>16</sup>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本色》裏所說的「從土裏長出光榮的歷史，自然也會受到土地束縛，現在很有些飛不上天的樣子」既不適用於溫州，也不適用於溫州人，且歷來如此。<sup>17</sup>但在另一篇文章中，費先生很恰當地解釋了後一個不適用，他說：「在什麼環境裏得到的生活，就會形成甚麼方

式，決定了這人群文化的性質。」<sup>18</sup>的確，溫州人的思想氣質一定程度上是溫州固有的自然地理環境的產物。早在1755年，盧梭就指出，「好像自然願意這樣調整事物以使他們趨於平等，在它拒絕把富饒給與土地的地方，便把富饒賜給了精神」。<sup>19</sup>相比之下，孟德斯鳩還說得更明確具體，即「有的地方需要人類的勤勞才可以居住，並且需要同樣的勤勞才得以生存……主要有三個地方是屬於這一類的，就是中國的江南和浙江這兩個美麗的省份、埃及和荷蘭。」<sup>20</sup>的確，出了名的溫州人的勤勞、智慧，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它那裏的地理環境之貧瘠出了名的緣故。馬克思的經典概括——「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sup>21</sup>——用在溫州的「存在」與溫州人的「意識」頭上是再「經典」不過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溫州人如此的思想性格其實是溫州那方水土養育的結果。

自古以來的「溫州精神」——吃苦耐勞、講究實際、敢為天下先，淡漠於意識形態，熱衷於物質利益，是溫州歷來最主要的思想文化內核。從歷史上來看，溫州俗文化素來就帶有濃重的「工商」色彩，「講實利」「求實效」向為溫州主流的感性文化，這是溫州異於全國其他地域的主要表徵。也正因為如此，晚清時期陳虬創辦利濟醫院並發行股票，就不像十餘年後譚嗣同在湖南瀏陽辦算學館那樣遭到來自各方面的冷漠乃至反對。譚開辦算學館的議論一起，其父親就「首發難端」，隨後即是「（譚嗣同）述及縣人，皆莫之應」。<sup>22</sup>由此也知，深處內地而商旅不便、宗族勢強且民風思古的湖南，其大眾的感性思想文化是習慣排斥外來新事物，與面海、開放的溫州差之天壤。這或許就是湖南縱有譚嗣同、梁啟超、唐才常等血性的維新志士並得到開明的地方官員像陳寶箴等人的支持，但其維新的實事、事功比之溫州知識群體來還是要稍遜幾籌。<sup>23</sup>又或許正是由於有這等原因及由之而結出的不一樣的維新結實，我們才敢認同：「浙江的改革先於戊戌變法，為全國提供了變法的具體樣本。」<sup>24</sup>

綜上所述，從遠距離、寬視界來看，晚清溫州知識群體在維新的大氣候下，坐言起行，既有進步激昂的變法維新思想，又有開拓務實的維新事業上的踐履躬行。這除了時代救亡需要的推動外，也還要歸因於溫州地域整體上的注重「實事事功」、「淡漠於意識形態之爭而熱衷於物質利益追求」思想文化底蘊。下面作者就謹以譚嗣同的一段話來道出其中的內核因素，同時把它當作是以一種「現實來源於歷史」的邏輯思考方式結束本篇論文。

來書盛稱永嘉，以為可資經世，善哉言乎。往者嗣同請業蔚廬，勉以盡性知天之學，而於永嘉則譏其淺中弱植，用是遂束閣焉。後以遭逢世患，深知揖讓不可以退萑苻，空言不可以弭禍亂，則於師訓竊有疑焉。夫浙東諸儒，傷社稷阽危，蒸民塗炭，乃蹶然而起，不顧瞽儒曲士之訾短，極言空談道德性命無補於事，而以崇功利為天下倡。揆其意，蓋欲外禦胡虜，內除秕政耳。使其道行，則偏安之宋，庶有豸乎？今之時勢，不變法則必步宋之後塵，故嗣同於來書之盛稱永嘉，深為嘆服，亦見足下與我同心也。<sup>25</sup>

\* 本文是對作者在浙江大學寫的碩士學位論文《晚清溫州知識群體的維新思想及其實踐》的最後一部分《評價與反思》稍作改動而成的。該論文答辯時被評為優秀論文，並入選2003年1月在溫州舉行的「溫州學」學術研討會參會論文。

## 註釋

- 1 學位論文的第四、第五章分別對這批維新志士的維新思想和維新實踐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爬梳、整理。
- 2 參見胡珠生編《陳虬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頁392、394。
- 3 孫詒讓和陳虬之間矛盾一直很深，根據宋恕的說法這主要是因為「獨陳志三（志三，乃陳虬的字）起，而以經濟之說與之（指的是仲容，孫詒讓）爭雄，溫州學子遂分二黨」——宋恕1898年12月致葉浩吾書，見胡珠生編《宋恕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594。孫詒讓在致上海維新志士汪康年的私人信件中如此評價陳虬和康有為的這段共事關係，可見他們之間意氣之爭的緊張程度。參見《汪康年師友書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頁1476。
- 4 胡珠生編：《陳虬集》，第312頁。
- 5 胡珠生編：《陳虬集》，第331頁。
- 6 語出宋恕致陳虬信，參見胡珠生編《陳虬集》，第418頁。
- 7 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中）（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頁409—410。
- 8 蔡尚思 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245。
- 9 參見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第601頁。
- 10 [蘇]列寧：《哲學筆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頁230。
- 1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18。
- 12 這僅僅是維新實踐方面的第一，在維新思想方面，晚清溫州知識群體也同樣有很多開風氣的「第一」主張，如第一次提出禮節、服制改革等等。
- 13 胡珠生編：《陳虬集》，第183頁。
- 14 那「就事論事式分析」，見論文的第二、第三部分。
- 15 據最新統計，溫州總面積是11783平方公里，其中山區占78.2%，屬丘陵地帶；東部是平原，占17.5%；沿海自北至南有150多個島嶼，海島面積占1.5%；江河水面積占2.8%。耕地面積在總面積中所占地比例甚少。參見項光盈主編：《世紀之交看溫州》（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頁274。
- 16 程俱：《席益差知溫州》，《北山小集》（上海：上海書店，1985）卷二十二。
- 17 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6-7。
- 18 費孝通：《費孝通文化隨筆》（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頁16。
- 19 [法]盧梭著，李常山 譯：《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頁86。
- 20 [法]孟德斯鳩著，張雁深 譯：《論法的精神》（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頁282。
- 2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82。
- 22 有關譚嗣同創辦「瀏陽算學館」的艱難，詳情參見《譚嗣同全集》「興算學議」一卷及鄧譚洲《譚嗣同傳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 23 朱維錚先生在談到湖南一地的維新運動時說：「所謂革新與守舊，所謂激進與保守，所謂創教與翼教，主戰場都一度移向長江中下游，而對峙的焦點，便在湖南省城長沙。」「就維新與反維新來說，湖南是帝國的縮影，卻又是地方色彩十分鮮明的縮影。」顯然，湖南的保守與溫州的開放一對比就更加的鮮明了。參見朱維錚、龍應台編著：《維新舊夢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頁68、71。
- 24 楊際開：《重溫戊戌變法》，載《浙江社會科學》1998年第5期。
- 25 此段有關浙江溫州永嘉學術的評論，出自譚嗣同1896年致其同志唐才常的信（見《譚嗣同全

集》第529頁)。在此書信中，譚嗣同暢論其對永嘉學術的有關見解。顯然，對於永嘉學術之所以產生及其主要思想，譚的分析都合理、到位。我們在理解晚清溫州知識群體的維新思想及其實踐時，既要看到晚清時代與南宋時期「時代命題」的相似性，又要認識到偏於東南一隅的溫州晚清能夠出現這麼一批有著強烈的國計民生關懷的知識分子與永嘉學術思想的傳承是息息相關，其產生必然大於偶然。現實是歷史的繼續，現在來源於過去，沒有溫州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事功思想傳統，就沒有晚清溫州知識群體那些超越時代的變法維新思想和成績卓著的維新實踐。

劉練軍 男，1974年生，江西九江人，歷史學碩士，助教，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研究。

---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七期 2003年8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七期（2003年8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